论永明文人的佛教实践

高文强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六朝文人接受佛教,不仅表现在思想观念与语言文辞上,他们还非常重视佛教实践活动,这在永明文人集团内表现得尤为突出。永明文人佛教实践之活动方式主要表现为交游名僧、参与佛事、践行教义和辩护佛理。而佛教实践活动的广泛参与,成为佛教影响永明文人之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永明;文人;佛教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4)02-0055-06

A Study o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Yongming Literati

GAO Wenqi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i accepted Buddhism not only from conception and language but also from practice in Six Dynasties. Yongming literati were even more prominent in this respect. Their Buddhist practices included: making friends with famous Buddhist monks, participating in Buddhist activities, practicing Buddhist doctrine and defending Buddhist theories. Their participations in broad Buddhist practices were the very important base on which Buddhism influenced the literary conception and literary works of Yongming literati.

Key words: Yongming; literati; Buddhist practice

六朝文人对佛教之接受,不惟在思想与文字上,还常常表现在佛教实践上。永明时期文人接受佛教开始趋向集团化,其中尤以竟陵文人集团内表现最为突出。[1] 竟陵集团作为永明时期最为著名的文人集团,同时也是一个佛教信仰集团,集团内之文人接受佛教之广度与深度已大大超过前代文人,特别是他们在佛教实践方面的广泛参与,将六朝文人接受佛教之程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考其详情,永明文人佛教实践主要有以下数类情况。

一、交游名僧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与"法"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常常是以僧人的实践与宣讲为承载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僧人就是佛教信仰的具象代表。因此,作为寺院僧众领袖的高僧,便常常成为在家信仰者皈依的对象。于是,名士与名僧交游,便成佛教兴盛时期士林中的普遍现象。永明时期尤为如此。

永明文人与高僧的交游,带有明显的集团化特征。竟陵集团本身就是一个高僧云集的场所,这与竟

收稿日期:2013-12-28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佛经中的文论关键词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作者简介:高文强(1969-),男,湖北孝感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佛教文化等。

陵王萧子良、文惠太子“同好释氏”,常“招致名僧”(《南齐书·萧子良传》)开展一系列佛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2](P349)这一次活动召集的高僧有多少,史无详载,但相信不在少数。再如“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之后又“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3](P405)这两次讲法所集僧众超过千人,由此可以想见竟陵集团与高僧交往的广度和深度。这里,我们以《高僧传》、《续高僧传》、《比丘尼传》中的记载,对与竟陵集团交往的高僧作一个简单统计。

1.《高僧传》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僧钟传	僧钟、昙纤、昙迁、僧表、僧最、敏达、僧宝	7	求那跋陀传	宝意	1
僧远传	僧远	1	僧审传	僧审	1
智顺传	智顺	1	智称传	智称	1
宝亮传	宝亮	1	法献传	法献、玄畅	2
法通传	法通	1	慧基传	慧基	1
慧明传	慧明	1	法安传	法安	1
僧祐传	僧祐	1	僧印传	僧印	1
僧辩传	僧辩、普智、道兴、慧忍、超胜	5	法瑗传	法瑗	1
法镜传	法镜	1	僧宗传	僧宗	1
法度传	法度、法绍	2	法愿传	法愿	1
保志传	保志	1	僧柔传	僧柔	1
道营传	慧祐	1	慧次传	智藏、僧旻、法云	3
慧忍传	慧满、僧业、僧尚、超朗、僧期、超猷、慧旭、法律、昙慧、僧胤、慧豪、法慈	12		合计	50

2.《续高僧传》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僧韶传	僧韶	1	昙准传	昙准	1
法护传	法护	1	惠超传	惠超	1
法宠传	法宠、智秀	2	慧约传	慧约、昙纤、慧次	3
	合计				9

3.《比丘尼传》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篇目	所载与竟陵集团交往之高僧	人数
僧敬尼传	僧敬尼	1	净晖尼传	净晖尼	1
智胜尼传	智胜尼	1	净秀尼传	净秀尼	1
僧盖尼传	僧盖尼	1	僧念尼传	僧念尼	1
净行尼传	净行尼	1	僧述尼传	僧述尼	1
道贵尼传	道贵尼	1		合计	9

上述知名之高僧共六十八位,若再计数所论未知名者,则难以胜数。故汤用彤先生谓“齐、梁二代之名师,罕有与其无关系者”,[4](P340)显然是言之有据的。

竟陵集团对高僧的聚集,为其中之永明文人提供了一个与名僧交游的绝好环境,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高僧周围每每聚集着一批文人,举例如下:

高僧	交游之文人	文献出处
法献	萧子良、沈约、王肃、王融、张融、张绪	高僧传·法献传
法安	萧子良、张融、何胤、刘绘、刘瓛	高僧传·法安传
法通	萧子良、萧嶷、谢举、陆杲、张孝秀	高僧传·法通传
僧远	萧子良、萧长懋、王僧达、何点、周颙、明僧绍、吴苞、张融、王俭	高僧传·僧远传
僧审	萧子良、萧长懋、傅琰、萧赤斧、王敬则	高僧传·僧审传

高僧	交游之文人	文献出处
慧约	萧子良、周顒、褚渊、王俭、沈约、娄幼瑜	续高僧传・慧约传
法护	萧子良、阮韬、阮晦、周顒	续高僧传・法护传
法云	周顒、王融、刘绘、徐孝嗣	续高僧传・法云传
僧旻	萧子良、萧长懋、王俭、张融、谢朓、陆倕、王仲宝、张思光	续高僧传・僧旻传
昙准	萧子良、萧映、萧晃、何点、刘绘	续高僧传・昙准传

同时，一位文人又常常与多位高僧来往，例如：

文人	交游之高僧
沈约	法献（《高僧传・法献传》）、慧约（《续高僧传・慧约传》）、法云（《续高僧传・法云传》）
王融	法献（《高僧传・法献传》）、法云（《续高僧传・法云传》）
王俭	法瑗（《高僧传・法瑗传》）、僧远（《高僧传・僧远传》）、慧约（《续高僧传・慧约传》）、僧旻（《续高僧传・僧旻传》）
张融	僧瑾（《高僧传・僧瑾传》）、道慧（《高僧传・道慧传》）、僧远（《高僧传・僧远传》）、慧基（《高僧传・慧基传》）、法安（《高僧传・法安传》）、昙斐（《高僧传・昙斐传》）、法献（《高僧传・法献传》）、僧旻（《续高僧传・僧旻传》）

永明文人与僧人在竟陵集团这样一个大的文化环境内所进行的交叉往来，使得文人与僧人之间关系形成一种复杂的立体形态，以致当时文学、佛学在许多方面的交融成为可能。这对永明文人话语方式、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参与佛事

竟陵集团常举行大型佛事活动，宣扬佛法，而其中最为常见的便是请高僧讲经说法，有时帝王也会亲自讲说。此外，这种佛事活动也包括供佛施僧、整理佛经等。在佛事活动中，若需文章，则皆出于名家之手，且这一系列活动常伴随有文人赋诗赞扬佛教的活动，因此，这些活动中一般都有文人的身影。

首先，我们来看讲法活动。据现有文献，竟陵集团所开展的讲法活动主要有：

1. 沈约《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这次法会是竟陵王亲讲，沈约则为此事作颂。

2.《出三藏记集・略成实论记》：“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执。即座，仍请佑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念四众净业还白。”

3.《比丘尼传・净晖尼传》：“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莫不服膺。永明八年，竟陵王请于第讲《维摩经》，后为寺主。”

4.《续高僧传・明辙传》：“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

5.《续高僧传・僧旻传》：“文宣尝请柔次二法师于普宏寺共讲《成实》……永明十年始于兴福寺讲《成实论》。”

上述讲法是记载了确切时间的活动，未记载确切时间的讲法活动，还有不少：

1.《续高僧传・法申传》：“逮齐竟陵王萧子良永明之中，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苦相征屈，辞不获免。”

2.《法护传》：“齐竟陵王，总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斋，以护为标领，解释胶结，每无遗滞，物益怀之。”

3.《惠超传》：“永明中，竟陵王请智秀法师，与诸学士随方讲授，西至樊邓，超因冯受学，同时合席，皆共服其领会。”

4.《比丘尼传・净行尼传》：“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厚加资给，僧宗、宝亮二法师雅相赏异，及请讲说，听众数百人，官第尼寺法事连续，当时先达无能屈者。”

5.《高僧传・僧印传》：“司徒文宣王、东海徐孝嗣，并挹敬风猷，屡请讲说。”

6.《昙准传》:“承齐竟陵王广延胜道盛兴讲说,遂南度止湘宫寺。处处采听,随席谈论,虽逢涂阻,未曾告劳。次公叹曰:‘此北道人。’”

7.《道禅传》:“闻齐竟陵王大开禅律,盛张讲律,千里引驾,同造金陵。……乃以永明之初,游历京室,住钟山云居下寺。听掇众部,偏以十诵知名。”

从上述记载可知,竟陵集团大开讲席,天下闻名,四方僧众,纷纷云集。其时讲法之盛况,可想而知。在这些法会中,人们常行忏悔及发愿。如竟陵王子良有《发愿疏》;沈约有《忏悔文》、《千僧会愿文》;王僧孺有《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

其次,召集学士名僧抄撮、删略佛经,也是竟陵集团常常举行的佛事活动。据《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抄经录》所载,记于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名下的抄经有《华严经》、《方等大集经》、《菩萨经》等经律凡三十六部,又《为法舍身经》六卷亦疑为文宣王所抄。此外,“永明七年十月,……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满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设三业三品,别施奖有功劝不及,上者得三十余件,中者得二十许种,下者数物而已。”[3](P405) 且请周颙为此节本作序。“抄经者,盖撮举义要也”,[3](P217) 而其中更表达了对佛法的虔诚之心。

既然是竟陵集团举办的活动,其中之文人自然会参与。上面所举发愿文、忏悔文,及沈约《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南齐皇太子礼佛愿疏》、《南齐皇太子解讲疏》、《齐竟陵王解讲疏》、《又竟陵王解讲疏》等一系列文章,及周颙《抄成实论序》,这些都可以看出,永明文人在这些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佛事活动可以说是士人与僧人交游的另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参与法会,对提高士人的佛学修养自然有较大帮助。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沙龙式的佛学环境,为竟陵集团营造出一种充满佛学味道的氛围,这种氛围反过来会影响到士人的言说方式、生活观念、人格心理等方面,而这一切都会投射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去。

三、践行教义

如果说交游名僧和参与佛事只是佛教信仰的表层表现的话,永明文人对佛教信仰更深层的表现方式则是对佛教教义的实践,这种将佛教信仰自觉地纳入到自己的行为规范之中的行为,对个人心理的影响显然要深远得多。

大乘“六度”以布施、持戒为首,常为在家修行者所重视。永明文人践行佛教教义亦特重二者。“布施度”为“六度”之首,强调以自己的智力、体力和财力去济度贫困者和满足求索者的要求而为他人造福积智并使自己不断积累功德以至解脱。佛教还宣扬向寺院和僧人布施,可以获得福田,积累功德,甚至于成就正果。后者尤受永明文人重视。

竟陵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作为竟陵集团首领,又为皇族身份,故布施就非常广泛。这包括:

1. 供养。《高僧传·法度传》:“度与绍并为齐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遥光恭以师礼,资给四事。”《慧次传》:“沙门智藏、僧旻、法云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发,并就次请业焉。文惠、文宣悉敬以师礼,四事供给。”《比丘尼传·僧敬尼传》:“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并钦风德,亲施无阙。”《僧盖尼传》:“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四时资给。”《净秀尼传》:“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厚相礼待,供施无废。”《僧念尼传》:“齐永明中,移住禅林寺,禅范大隆,诸学者众,司徒竟陵王四事供养。”

2. 修寺。《高僧传·智顺传》:“齐竟陵文宣王特深礼异,为修治城寺以居之。”《法护传》:“齐竟陵王总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斋,以护为标领。”《比丘尼传·僧述尼传》:“齐文惠帝、竟陵文宣王大相礼遇,修饰一寺,事事光奇,四时供养,未曾休息。”《道贵尼传》:“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善相推敬,为造顶山寺以聚禅众。请贵为知事,固执不从,请为禅范,然后许之。”

3. 造像。造佛像本南朝帝王布施之常行,如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载有《宋孝武皇帝造无量寿金像记》、《宋明皇帝造丈四金像记》、《齐武皇帝造释迦瑞像记》、《皇帝造纯银像记》等记述造像之文,其中亦有记文惠文宣造像之事的《宋明帝齐文皇文宣造行像八部鬼神记》,帝王造像或多,但当时记载亡佚,后世追述又多附会,许多已难考定。

4. 舍身。南朝帝王之中也非常盛行，最有名者是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之事。所谓舍身，于舍资财之外，并舍自身。舍自身者，乃自愿入寺执役，故《北山录·异学篇》言及梁武帝，有注云："三度舍身入寺，与众为奴。"《南齐书·萧子良传》谓竟陵王集众僧，"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就是一种舍身行为。又《为文惠太子解讲疏》云："敬舍宝躯，爰及舆冕，自缨以绛，凡九十九物。"[2](P348)《为南郡王舍身疏》亦云："敬舍肌肤之外，凡百十八种。"[2](P350)

不过，竟陵集团中其他文人布施记载并不多，这恐与他们自身之地位有关。一般士大夫不可能像帝王般建寺造像，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经济实力。但他们在礼敬高僧时，必多布施。但这种布施与帝王相比，如九牛一毫，因此难见记载。不过，从现在有文献记载中，仍可看出他们的布施行为。如《南齐书·张融传》："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条)钱帛，融独(条)百钱。帝曰：'融殊贫，当序以佳禄。'"又沈约有《舍身愿疏》曰："兼舍身资服用，百有十七种，微自损撤，以奉现前众僧。"[2](P351)

持戒是永明文人践行佛教教义的另一重要行为。南朝士人所守持的戒律最常见者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为在家弟子制定的一种临时奉行之戒律，如一个月中奉行六天，一天也行，可以灵活实行，故更易为士人所接受。《南齐书·萧子良传》所载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所营即八关斋戒，这是南朝奉佛帝王常率群臣进行的活动。斋戒时最重要之事，首为蔬食。如《宋书·袁粲传》载："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袁粲因食肉而免官，可见蔬食之重。其次是过中不食，《广弘明集》载有沈约《述僧中食论》，即论此戒。

竟陵王子良常于西邸举行斋戒活动，因此西邸文人中的许多重要成员都严守佛教戒条。《南齐书·周颙传》载："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可见竟陵文人持斋，亦首重素食。这种清贫寡欲的生活方式，在竟陵文人中常可见到。如王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南齐书·王俭传》)；沈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梁书·沈约传》)；刘虬"精信释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南齐书·刘虬传》)；何胤"精信佛法，无妻妾"(《南齐书·周颙传》)等等。竟陵王萧子良还请人专门负责斋讲之事，《南齐书·徐孝嗣传》载："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庐江何胤掌知斋讲及众僧。"从这里可以看出竟陵集团进行斋戒活动应是经常的，这些活动中同样伴随着竟陵文人对斋事赞颂的创作活动。这从沈约所作《八关斋诗》中可以看出："因戒倦轮飘，习障从尘染。四衢道难辟，八正扉犹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险。迷涂既已复，豁悟非无渐。"[5](P365)沈约依据慧由定生、定依戒起的道理，指出斋戒的意义所在。

竟陵文人对佛教教义的实践，使佛教融入到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这对他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四、辩护佛理

南朝文化论争多起于佛道二家。汤用彤先生曾言："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斗之结果，往往为武力之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据为理论。而其争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一为神灭，一为夷夏。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倾覆释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4](P344)南齐之际也发生了有关二者之论争，而论争过程中，崇佛之文人成为辩护佛理的重要力量。

首先，我们来看夷夏之争。

夷夏之争由宋末顾欢作《夷夏论》而引发。顾欢"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南齐书·顾欢传》)，因此佛教徒常称其为"道士"。《南齐书》本传谓"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故欢著《夷夏论》以论之。顾欢于《夷夏论》中"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他虽然论证了佛道二教同本共源，但其根本目的在于论证道优于佛，认为推广道教比扶植佛教对维护封建纲常更有力。因此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佛教信徒的辩难。当时便有司徒袁粲托为僧人通公著论驳之，指明佛教优于道教。入齐后又有不少佛教徒进行辩难，据《弘明集》载，有明僧绍《正二教论》、谢镇之《与顾道士书》和《重与顾道士书》、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朱广之《谘顾道士夷夏论》、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释慧愍《戎华

论——析顾道士〈夷夏论〉》等。这些文章都反对顾欢观点,认为佛教优于道教,不能借夷夏之辨来排斥佛教。竟陵集团为永明文化中心,这场佛道争辩自然会波及其中。

《南齐书·顾欢传》载"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释法。吴兴孟景翼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园。众僧大会,子良使景翼礼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经》与之。景翼造《正一论》。"《正一论》旨在统一道佛,以为信佛信道,本无分别,"共遵斯一"。其时张融作《门律》,以为"道之与佛,逗极无二",与孟景翼持论类似。当时竟陵集团内佛教兴盛,论佛道二法无异,实为道教张目,故受到竟陵文人周颙的驳难。周颙主要针对张融的《门律》展开辩论,他著有《答张融书难门律》、《重答张融书难门律》等文竭力区别二教,抑道扬佛。而张融也著有《以门律致书周颙等诸游生》、《答周颙书并答所问》等文与周颙反复辩难。史载"往复文多不载"(《南齐书·顾欢传》),可知他们论辩文章恐不止这些。从张融以《门律》至书"诸游生"看(二何二孔),与之讨论者可能尚有他人,但所论文字现已不载(孔稚珪论文有片言)。

其次,我们来看神灭之争。

永明年间的神灭之争,则由范缜挑起。《梁书》本传云:"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一出,朝野哗然,因为中国佛教向执神明相续以至成佛,若证神明之不相续,则佛教根本倾覆。因此萧子良立即集僧难之,从而在竟陵集团内引发一场大争论。众僧难范缜的具体内容史已难详,不过仍未能屈之。竟陵文人也有写文章来批驳范缜的,如沈约便有《形神论》和《神不灭论》两篇。萧衍与范缜本有西邸之旧,入梁后其以帝王之尊纠集释法云、东宫舍人曹思文以及沈约、范云、陆倕等六十六人,先后写了七十余篇文章,再次围攻神灭论。可见永明年间开始的这场论争持续之久远,而亦可见出信佛士人辩护之用力。

永明佛道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文化地位之争。儒学因其是古代中国的王道政治、宗法伦理的根基所系,在中国士大夫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虽然魏晋是玄学昌盛,儒学式微,但至刘宋以来,儒学地位复尊,作为统治思想根基的地位终南朝而未变。佛教徒对这一点是有清醒认识的,故佛教至东晋后始终以调和儒释为发展方针,两者矛盾基本被化解。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士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6](P219) 道教并不像儒学具有强大的政治、思想背景,对它的反击不会直接危及佛教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佛道之间在许多基本观点上是直接对立的。如,"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济众;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故服食以养生";[7](P559) "释氏即物为空,空物为一;老氏有无两行,空有为异";[7](P613) "仙化以变形为上,泥洹以陶神为先"(《南史·顾欢传》),等等。不过,从佛道辩论的历史看,思想、教义的歧异并不是佛道之争的主要原因,倒是诸如夷夏之辨,本末之争,谁更有利于中国的王道政治,谁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伦理等问题,常成为二者争论的焦点。因此,永明佛道之争,很大意义上是文化地位之争。而永明文人的大量参与,使佛教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产生广泛影响。

参考文献:

[1] 高文强. 东晋南朝士人与佛教之关系浅析[J]. 宗教学研究,2006,(3).
[2] 严可均. 全梁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僧 祐. 出三藏记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4]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 陈庆元. 沈约集校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6]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M]. 北京:三联书店,2001.
[7] 严可均. 全宋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责任编辑:张立荣)